



论《银鱼来》的乡土叙事艺术

On the Local Narrative Art of "The Silver Fish Comes"

马玉皎¹

MA YUJIAO

泰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E-mail: ma.y@ku.th

吴琼²

KANOKPORN NUMTONG

泰国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E-mail: kanokporn.n@ku.th

Received: 30 August 2023 / Revised: 16 December 2023 / Accepted: 17 December 2023

摘要

《银鱼来》讲述了黔北地区范、孙两个古老家族百年的恩怨情仇，真实地再现了黔北地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民情风俗以及社会动荡中人们的生死命运。在小说中，人们无论何时、无论遭遇怎样的困惑和挫折，都坚强地活着，“银鱼”也成为祈盼和平、祈盼幸福的象征。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文本细读法、人物传记研究法，研究文本的乡土叙事艺术体现在哪些方面。通过分析得出：一、在风俗与信仰方面的叙述包含着朴素多彩的民风民俗，生活中依旧保留了原始宗教信仰——巫文化。二、叙事技巧通过乡民形象和乡民不幸的命运以及日常生活中运用的方言来体现。三、在意境的表现中运用了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两种比较突出的叙事方法。

关键词：《银鱼来》；乡土叙事艺术；中国小说

ABSTRACT

"Silver Fish" tells the century -old resentment of the two ancient families in the northern Guizhou region and Sun, which truly reproduces the lives and deaths of people in the living environment, lifestyle, folk customs and customs of the northern Guizhou region. In novels, no matter when and no matter what kind of confusion and setbacks they encounter, they are alive strongly. "Silver Fish" has also become a symbol of praying for peace and hope. This article is reflected in what aspects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ext reading



method and character biography research method. According to analysis: 1. The narrative in terms of customs and beliefs contains simple and colorful folk customs and the original religious beliefs -witch culture still retains the original religious beliefs in life. Second, narrative skills are reflected through the image of the villagers and the fate of the villagers' unfortunate fate and the dialects used in daily life. Third, the two outstanding narrative methods are us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Key words: "The Silver Fish Comes", Local narrative art, Chinese novel

引言

作家冉正万，生于贵州省余庆县。2012 年推出的长篇小说《银鱼来》讲述的是在黔北崇山峻岭中，范、孙两大家族的百年恩怨情仇的故事。两大家族在这里靠着大自然赏赐的银鱼世代生存了数百年。民国时期，局势动荡，因为杀害红军一事，范家与孙家矛盾激化；国共内战时期，两家又因信仰和归顺的分歧导致分道扬镳；五六十年代，积攒的仇恨又延续到了两大家族的后人身上……近百年来范、孙两家仇怨不断，然而最终他们的后代却放弃恩怨，选择宽容，重归于好。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先生称其为具有“突破性价值”。（重庆晨报，2012）《银鱼来》以一位百岁老人的视角审度百年家族命运，表现边地人民独特的生存体验，反映近现代社会历史对边地黔北的影响。该作品一面世就引起热议，最引人关注的评价是被视为“贵州版的《白鹿原》”，这一观点在评论界与媒体的评价中被频频提及。由于地域偏僻和经济落后，贵州文化一直处于“欠发达、欠开发”的现状，贵州文学也长期以来被看作是对中心的追随与复制的赝品，没有自己的创新和个性。《银鱼来》刚推出，就出现“《银鱼来》是《白鹿原》的贵州版”的评价与定位，肯定了它的地位。《银鱼来》是黔北土地里长出来的，散发着这片土地特有的泥土气息。边缘化的历史叙述、山地封闭的原始初民般的生活画卷使这部小说独放异彩。

目前对《银鱼来》的分析，有从作品所蕴含的独特的巫文化着手，有从作品中体现的人性着手，也有通过作品来分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生态意识的，目前没有从作品的叙事角度对文本进行分析的，本文意图从叙事艺术这个角度深入分析作者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在艺术创作上面的独特的视角和表达方式，以及作品如何反映当地独特的社会文化。通过研究文学叙事艺术，可以更深刻的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

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文本细读法、人物传记研究法对文本的分析以期探究小说的乡土叙事艺术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



文献综述

2012年，长篇小说《银鱼来》由大型文学刊物《人民文学》推出。《人民文学》2012年第9期共208页，冉正万的长篇小说《银鱼来》就占了122页。但 2013 年才出现了《银鱼来》的相关评论，且热评、快评、短评、浅评居多。

目前为止，关于《银鱼来》的研究仅有一篇硕士论文，期刊八篇没有博士论文专著出现，本文搜集整理的主要是报纸和期刊上的相关评论与论文。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平台查找发现，《银鱼来》首先在《中华读书报》《文艺报》等报纸上被重点介绍，然后在《小说评论》《文艺争鸣》等期刊论文中出现印象式点评。直到2013年9月，出现专篇对《银鱼来》进行具体研究的期刊论文。

短评：

2013 年 5 月 10 日，《文艺报》刊登名为《突破百年历史之叙述瓶颈——评冉正万长篇新作〈银鱼来〉》的文章，从小说“借力开放的巴楚文化传统破解叙述困境”“借用人性的光束照亮百年历史”“释放细节的能量”，三个方面具体揭示出《银鱼来》突破性何在。巫楚文化以及边地生存境遇下独特人性的发掘与展示，是《银鱼来》“与生俱来”的气质与魅力所在。吉狄马加也认为“《银鱼来》提供了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丛刊》主编）中肯地评价道：“《银鱼来》是这几年令人惊喜的小说……对百年历史的思考，对边地人性的表现，对巫文化元素的表现，无论从结构还是到追求，《银鱼来》在整个长篇小说版图中来说都很有实力。”可以说，《银鱼来》的“突破性”价值被一点一点挖掘和凸显出来。

《新世纪贵州小说的主题景观》一文认为《银鱼来》的独特历史叙述方式、边地文化的描绘以及人性探索方面的确是为贵州家族叙事做出极大的贡献。因为“作品的叙述跨越了中国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了社会巨大的变迁对每个人产生的不同影响，真实地再现了社会动荡中人们的生死命运及黔北地区的生存方式与民族风情。”

期刊：

1. 从文化角度进行阐述

长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张羽华《当代文学视域中的乡村文化透视——评冉正万长篇小说〈银鱼来〉》一文中，作者认为作家通过文化记忆的方式，以经验化的想象性叙述，将这个地区被现代文明肢解的巫术文化重新纳入艺术建构的体系，使得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通过艺术的形式得以延伸和传承。不仅如此，“巫文化的神秘性是带给陷入绝境境地的人们以心灵的寄托与安慰。”

遵义师范学院王清敏《民族文化土壤上的硕果——〈银鱼来〉评析》具体指出小说中有很多如“卖魂”等具有“巫文化”色彩的描述。《冉正万〈银鱼来〉评介》不仅针对文本意义，还立足现实，分析说：“小说里的‘巫文化’描写不仅增加了故事的‘可读性’，还体现出全球化时代作者对于小说异质性的不懈追求。更重要的是，巫文化是上古时期人类在繁衍生息、推进社会发展中，创造的一种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原始文化。小说中的地域背景处于巴、楚文化相交的末端，或许正因为如此，反倒保持住了很多已经消失的东西。”从某种程度上看，巫文化才是《银鱼来》在当下文化建构中独特性的根本所在。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刘志财《发掘历史存在现场探究乡土人生悲欢——冉正万长篇小说〈银鱼来〉略论》一文认为乡村四牙坝在走向现代化时，乡间的美与人性的善也在逐渐失去。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杨捷《一种家庭主题的两重演绎——〈银鱼来〉与〈白鹿原〉比较》一文认为贵州属于远离中原地区的蛮荒之地，它远离中原的儒家文化。《白鹿原》里充满了关中平原的快意恩仇，而《银鱼来》中尽是黔北山水的温和包容。

2. 从生态角度进行阐释

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刘丽娟《试论冉正万小说〈银鱼来〉中的生态意识》认为小说的表层结构是以银鱼为主线，描述孙、范两个家族百年的历史，其深层结构却在讲述自然生态的平衡——破坏——再平衡的问题。作品通过叙述特定生存状态下发生在“四牙坝”这一封闭结构中的一系列生活事件，从而引发了作者对人与自然应该如何和谐相处这一全球性的问题的沉思。

3. 对作品的评介

郑州大学文学院李勇《边地叙事的局限——评冉正万的〈银鱼来〉》指出连绵不绝的群山，地域特征对作者的叙事产生了一定的局限性。

贵州民族大学杜国景《〈银鱼来〉对话三重批评》认为在地域文学的风格论之后，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学、文学地理学、文学人类学、后现代空间理论等已陆续崛起，它们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宏大的理论性、学理性。在这样的背景上，动辄仍用巫文化去分析那些来自巴蜀、滇黔以及荆楚的文学创作，实质还是在走地域文学风格论的老路子，将无由面对新一代作家的创新意识。

湖北文理学院的王海燕和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魏耀武《冉正万〈银鱼来〉评介》指出小说不仅从容自然而又深刻独到地写出了巫文化之于人物心理、性格的影响，也在贵州乡风民俗的背景下，真实地刻画了人物具有社会性质的特殊遭际和心理。

硕士论文：

邓小敏的硕士论文《银鱼来》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格——以《白鹿原》为参照的研读，分析了其文化价值与审美内涵。

以上已有的文献三篇是从文化入手分析作品中的“巫文化”，杜国景则对从“巫文化”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批判研究者缺乏创新意识。两篇将《银鱼来》与《白鹿原》作对比，一篇着重从生态意识角度对作品中的生态观进行阐述。目前还没有从叙述角度对作品的叙事风格进行分析，本文从叙事角度对作品分析为深刻地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为前人研究添砖加瓦。

研究方法

《银鱼来》采用了新世纪以来常见的家族叙事框架，根据这个特色本文采用以下方法来进行研究：

1. 文献研究法。

细读关于作品研究的文献资料，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从宏观上把握作品整体研究情况，拓宽研究的视野，并确立自己的研究视角。



2. 文本细读法。

以《银鱼来》为研究文本，精细阅读作品，在整体把握和梳理文本内容的基础上，了解乡土叙事的主题内涵，揣摩叙事技巧，感受文本语言，从而对冉正万的创作有一个整体的认知。

3. 人物传记研究法。

通过作者的人生经历、乡土生活经验来全面把握其精神世界的经纬，从而更好地探析作者文学观和创作风格形成的原因。

一、《银鱼来》的风俗与信仰叙事

《银鱼来》以黔北山区为背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不仅孕育了神奇瑰丽、五彩斑斓的自然风光，也滋养了淳朴敦厚且极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民风。

(一) 朴素多彩的民风民俗

民俗就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具有历史传承性的民间文化，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 地域性特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域文化的形成，中国地域广袤，南北方的水土差异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民风民俗的衍生及发展。正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民俗形态、内涵韵味等等都会因地制宜。从战国秦汉到唐宋，历经两千多年的积累，黔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受巴蜀、荆楚文化较深影响的独特文化圈。这个文化圈里的文化，是介乎于长江上、中游之间，即巴蜀文化与楚湘文化交汇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书中对擦耳岩有着这样的描写：擦耳岩在一个崖畔上，坡上一片白水梯田，崖下一条小溪，默默地流，宁静而遥远。木瓦房在竹林的掩映下，浮着袅袅炊烟。（冉正万，2012，115）这样如画般的地域特色与北方的地域特征截然不同。南方的水梯田以稻谷为主，所以文中人们的饮食也以米、糍粑为主食，因为溪水比较多所以鱼则成为常吃的肉类。作品名字“银鱼来”的命名也是因为书中四牙坝这个地方山坳里每年夏季的汛期会有银色的鱼被溪水冲出来，这些鱼因为稀有所以能卖的上好的价钱成为当地老百姓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

2. 社会性特征

“人是文化的产物，民俗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占有决定性的地位”。（钟敬文，2010，23）民俗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与人们的生活发生着最为紧密的关系。例如：为了供奉祖先所以建造了祠堂，女儿出嫁要准备酒水，孩子满月要准备满月宴等等，这些民俗活动已然成为人们的日常并且代代相传。

3. 审美性特征



民俗是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实践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卓越文化传统。它符合民族内部大多数成员的审美观念，因此成为这些成员的审美对象，具有明显的审美特征。民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定区域内人们的情感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人们内在审美心理的外在表现。由于民俗审美活动的时间持续长、范围广，对人们的心理、行为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形式多样的民俗呈现出具体但又不尽相同的感性形象，赋予人们审美愉悦，并激发了人们对于美的向往和追求。无论是民俗事件还是民俗活动，它们以美的形式和内容构建出一个审美世界，展示出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风貌。

民俗是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丰富的形式表现和内在意蕴的载体，有着非常深厚的审美价值。“民俗风情是重要的审美领域”它涵盖的内容可谓十分丰富，不仅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图景，也有个人和群体生活的真实记录。就民俗而言，它以特定的方式，包括民俗物象和民俗活动，呈现出具体的感性形象，并体现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银鱼来》中，饭团、玉米饼、香肠腊肉、干豆豉、米糕、炒米糖等等都是随处可见的边地风物，而忙碌的年节、热闹的婚丧仪式、壮观的鱼汛捕捞更是饱含了浓郁的地域风情。黔北的民风民俗形态多样，作者通过对故乡生活的体验，对事物审美的转变和升华，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别样的乡土世界。民俗的审美价值通过民俗物象、民俗活动给人们带来感性愉悦，与此同时，它还蕴含着深厚的价值内涵，经过历史的浸润，早已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 原始宗教信仰——巫文化

巫文化是起源于原始时代的一种文化形态。人类上古创字是有规律的，在甲骨文、金文都有“巫”字。从字形上来讲，巫从“工”从“人”，“工”的上下两横分别代表天和地，中间的“丨”，表示能上通天意，下达地旨，例如《山海经》中的共工就是担任此职务；工加上“人”，就是通达天地，中合人意的意思。古人认为，巫能够与鬼神相沟通，为天地鬼神与人交通的媒介者。

“巫”字的甲骨文象古代女巫所用的道具，小篆像女巫两袖舞形。所以字的本义为：古代称能以舞降神的人，从事此活动的人，男称覡，女称巫，在不同的时期和地域，“太”又心妖术师，术士、医巫、萨满、祭司、占卜师、魔术师等。在客家方言中，“巫”字读为 mo（同魔），可表明古代中原地区，是“巫魔不分”的。

1. “万物有灵”论

在原始社会，人类在繁衍生息中，崇拜自然，认为万物有灵。《银鱼来》中范若昌办了一场盛大的满月酒庆祝儿子的降生，天上忽然下雨，范若昌正准备回屋，看到一条黑灰色的蟒蛇，蟒蛇抬起头，看了范若昌一眼，吐出巨大的信子，大摇大摆地梭走了。看到蛇后他的想法是：“人家来祝贺你呢，有什么好怕的？”这种想法让他心有余悸却又心花怒放。蛇是小龙，莫非和自己儿子有什么关系？据说香溪镇上有一户姓赵的教书先生，和儿子在月下背书时，一条两尺长的白蛇围绕父子俩游了三圈，先生忙磕头作揖，感谢白蛇报喜，后来，这个儿子果然考中了举人。范若昌对自己的联想且惊且喜，并惭愧刚才被吓傻了，没给蟒蛇磕头作揖。走了几步，回头朝蟒蛇消失的方向



深深鞠了一躬，算是补救。

若是儿子有出息，银鱼算得了什么，家当算得了什么。他甚至从蟒蛇联想到“蟒袍”，要上几品才可以穿蟒袍呢？戏台上见过，现实生活中从未见过。他立即发现自己想得太远了，于是忙摇摇头，把这不切实际的想法赶出去。（冉正万，2012，17）

后面他的兄弟范若奎用枪打死了这条蟒蛇，让他心生不悦。他撇下兄弟，悄悄找了几个人，和他一起把蟒蛇拖到竹林里埋了。蛇和竹子具有相似的形象，四牙坝因此认为竹是蛇的祖宗。范若昌心想，把它埋到竹林里，以便它的灵魂在老祖宗的庇护下安息，不要对人有什么仇恨才好。范若昌对蟒蛇的死一直深感忧虑，他在这种忧虑的漩涡与恐慌中不知所措，总觉得它会在某个时候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进行报复。

在范若昌的心里这条巨大的蟒蛇是有灵性的，并且是可以给他带来好运和护佑他的，惨遭他兄弟的屠杀，他总隐约感觉是会遭到报复的，后面四牙坝又出现了四脚鸭蛇。他又将这种自然的生物认为是一些事物出现的征兆：

“这就是灾，灾难已经来了。”范若昌说。他认为，这正是日本鬼子即将到来的标志，这些蛇呀，其实和其他生灵一样，是最慈悲的，它们不是伸脚给你们看叫你们死，而是要告诉你们，日本鬼子要来了。“你们看嘛，日本人个子矮，它们伸出的腿那么短；日本鬼子穿的是大头皮鞋，你看它们的脚掌是那么厚。”（冉正万，2012，163）

2. 驱鬼巫术

驱鬼巫术多有相应的仪式和特定目的，以攻击的方式进行。既然相信万物有灵，那么死去的人就是有魂的，为了防止鬼魂加害于自己，会有一些方式来做法，认为可以避邪驱鬼。

孙国邦的女儿花荣的病治不好了，他的媳妇罗稻香认为是死去的大娘魂魄附在女儿身上，因为大娘的病与女儿花荣几乎一样，所以让孙国邦削三只竹签钉在大娘的棺材上，认为这样大娘的魂就可以被钉住。

3. 符咒巫术

符咒巫术比其他巫术略晚。符指的是符文，符篆等独有秘文。咒是作法时念动的咒语。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尖峰山在很多人的心里既神秘又遥远。传说山上有个小道士，掌上有肉印，以朱红拓符，把符贴在锄头上，锄头就会到地里去干活；把它贴在簸箕上，坐在簸箕里就能日行三百里；把它贴在病人的肚子上，不管什么病，即便将死的人，也会死去活来。……范若昌和村里人一样，对神符的作用也将信将疑。暗想贴张神符锄头就自己干活是不可能的，但驱神辟邪的作用肯定是有的。（冉正万，2012，149）

四牙坝的老百姓信这个符咒能起到一些超自然的威力，作为村里的知识分子也是掌权的大当家对符咒的作用也是持一定的肯定态度。

4. 祈求巫术



人们利用献祭或者讨好、哀求等祈求手段，祈求祖先或者神明降福免灾，保护自己，借以达到自己的理想目的和心愿。像民间的求风求雨，求财，求福禄之类的。国家祭祀中大雩礼仪类的都在此列。

祈求巫术是古巫术中最普遍，最常用的巫术。都有相应的仪式和术法。在宗教中也较为多见。其中的朝廷到地方常用到的四时之祭和大雩礼都需要皇帝或者官员亲自致祭的。也是被延续成传统习俗最多的一种巫术。

小说中佑贤结婚的时候要“卖魂”，因为土司统领这方水土时，青年男子年满十七岁后随时会被土司的牛角声征召去打仗，家里人为了祈祷孩子不要死在战场上，满十七岁后就让他先在家里死一回，把魂寄卖给罗汉松。他们认为，做过这种仪式，孩子在战场上受伤后也不会死，因为受伤的是他的肉体，他的魂在罗汉松那儿，只要回到家乡，通过法术再把魂赎回来，他就会重新活蹦乱跳，仍然是一个男子汉。（冉正万，2012，226）

二、乡土“叙事”中的黔北乡土特征

（一）意味深长的乡土叙事技巧

冉正万的乡土小说本身具有浓浓的地域色彩，展现黔北农民的生存状态之外，作者在小说中自觉运用了一系列高超的叙事技巧和手段，包括细腻的细节描写、象征性的意象使用、充满寓意的反讽修辞以及叙事的极简与省略艺术等等，不仅增强了小说的表现力，使小说传达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更使小说中乡土世界的原始性、黔北农民的深层心理得到了充分展现，对读者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

1. 细节描写细腻塑造乡民形象

细节描写将目光聚焦到人物或事物的细微之处，加以生动隐隐地嫌弃，人物内心世界复杂的情感便能表现出来，并且暗含于细节中的丰富意义能放慢读者阅读速度，以理解小说传达的深层含义，从而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人物。作家冉正万在小说中细节的刻画起到点睛的效果，引起读者的共鸣。

书中只对杨玉环一人的欲望描写非常的细致：她尽量不去胡思乱想，这本是很好的，可夜深人静，身体之外的，身体之内的，一切活着的和死去的东西都像势利小人那样全部站到她面前来。她本意是不理它们，可它们时而威逼利诱，时而搔首弄姿，时而妖娆妩媚，时而鬼头倒把，时而摘肝摘肺，时而冷若冰霜，时而大大咧咧，时而刁钻古怪，弄得她防不胜防，又烦不胜烦。（冉正万，2012，125）

连续八个“时而”将杨玉环体内的欲求表达的淋漓尽致，隐隐地嫌弃了欲望在体内对她的折磨和引诱。

小说中佑贤看到尹得高和他儿子新元抬着一只老鹰正从林子里钻出来。林子外面是一段下坡，



尹得高心疼儿子还小于是他悄悄把挂鹰的绳子往后拉了拉，但还是被儿子新元发现了，回头叫道：我抬得动。就这个小动作，充分体现了父亲对儿子的爱，可是儿子却不撒手，倔强又可爱，于是当父亲的为了照顾儿子的自尊又把绳子重新放到儿子认可的位置。这个细节被佑贤敏锐地捕捉到，然后心里暗自感叹自己的父亲很不会关爱孩子，缺失了那份父爱。更让人心疼。

2. 乡土意象象征黔北乡民不幸命运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一文中初次对“意象”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意象由神思构成，进而形成可达的文辞。（冉正万，2012，118）在这之后，对“意象”的研究和阐释逐渐增多，并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学界认为，意象是融入作者的主观情感的客观物象，是作者心灵观照之物。意象本身不仅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还具有建构文本的功能，成为文中的穿珠之线。冉正万便在小说中借不同的意象传达着人物的现实处境或情感思绪，极大地丰富了小说主题。

小说中范若昌在给儿子办满月宴的晚上遇到一只蟒蛇，蟒蛇没有伤到他，游走了，范若昌视这条蟒蛇为神灵，却被自己的弟弟范若奎用枪打死，自此心里隐隐担忧，后来村里出现了鸭脚蛇，他的心智被扰乱，他把它和若奎打死的大蟒蛇联系起来。他对蟒蛇的死一直深感忧虑，他在这种忧虑的漩涡与恐慌中不知所措，总觉得它会在某个时候以出乎意料的方式进行报复。（冉正万，2012，167）而蟒蛇这个意象对范若昌和弟弟范若奎来说都预示着最后结局的悲惨，哥哥范若昌被沉塘，弟弟在剿匪的时候被杀，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花容来月水，肚子阴痛不想去拉鱼，但是因为爹爹的执拗没办法说，跟母亲说了，但是母亲没多问，让她去问她爹，花荣很伤心，赌气给锅底烧火的时候想起和弟弟佑能玩过的一只蜻蜓，佑能把它的尾巴掐掉一半后插了根草根，拖着长尾巴的红蜻蜓飞得很慢，摇摇晃晃，它还是那只蜻蜓，然而它已经不是那只蜻蜓了。花容觉得自己什么地方和这只蜻蜓有点相像。（冉正万，2012，52）花容在经期去拉鱼，冰寒的河水给她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下半身经常大量出血，没几年人就走了，像极了尾巴被掐掉的蜻蜓，等待她的只能是慢慢耗干自己然后隐隐地嫌弃。

杨玉环嫁到范家生了子之后，不仅剥夺了她做母亲奶孩子跟孩子亲密的权利，还不允许她笑，范若昌隐隐地嫌弃她，从不碰她。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断地被压抑着，她只能抽空去放牛，自己在山间与孩子们嬉戏的时候才感觉自己是轻松愉悦的，但是漫长的生活摆脱不掉的束缚一直让她忧愁，虽然嫁了过来，但是却没有家的感受，所谓的“家人”一个个都很压抑，不真实，日子对她来说平淡且煎熬。在一次放牛的时候她心里突然热辣辣的，难过得要融化了一样，就像一条自由自在的鱼突然发现自己的在油锅里一样。她差不多被这种感觉吓了一跳，因为她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这是第一次。她慢下来，深呼吸几口气，以此证明自己并不像那尾鱼那样惨。（冉正万，2012，128）“鱼”暗示或象征着人物的命运，她的日子如同这条鱼一样慢慢地走向死亡，自己最后被迫悬梁自尽。

（二）基于日常生活的方言叙事



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对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呈现具有重要的作用。冉正万在他的小说创作中，运用日常化的方言叙事，呈现出真实生动的乡土世界。他将这种方言作为一种言说的语境和思维的框架，使整个小说萦绕着民间生活的色彩。他善于将生活中的方言土语娴熟地应用到小说语言中，包括原生态的地方性口语和特殊的方言词汇，这不仅增添了小说的乡土韵味，而且更好地传达了小说人物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生动贴切的谚语和俗语，这些与民众日常的生产生活相关，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挺尸”“守嘴狗”“抠猫夹壳”“乍包”“穷骨头发烧，用不着穿那么多”“挨刀砍的”“胆大骑龙骑虎，胆小骑老鸡母。”“爱假巴郎的”“流氓锤”、见蛇不打三分罪”“夺命一条罪七分”“初一忌西行，初八忌南行，十五忌东行，月晦忌北行。”这些俗语均来自于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新鲜灵动、形象贴切，富有生活实感。这些方言俚语是人们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是一种经验性的民间话语，与使用者的地域生活环境、生存体验、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承载了黔北独特的地域文化。

冉正万在作品中穿插了通俗易懂的民间俗语，不仅突出了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也体现了普通大众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这些语汇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有助于人们了解人情世态、总结社会经验，也激活了民间语言的生命力。他的小说语言中还有一类特殊的方言词汇，表现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态度和行为选择，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如“安逸”——开心、满足，“日脓包”——笨蛋、傻瓜，“卯事”——什么事，“清丝雅静的”——十分清静，“鬼头倒把”——不正经、衣冠不整、奇装异服或霉烂烂糠，“吼儿妈鬼”——叽叽喳喳、吵吵闹闹，“细娃”——小孩子。这类方言词汇丰富多彩，韵味深刻，但是鲜见于书面用语中，往往只流行于民间口语中。冉正万将这种代表着一定民俗文化的活化石运用于小说语言中，不仅表情达意准确生动，而且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冉正万的小说中也吸收了一些黔北方言中的叠词，如“扑拉拉”“瞪瞪地”“青幽幽”“柴柴”“饿瘪瘪”“死瘪瘪”“嗯啦嗯啦”“灰塌塌”“叽叽呱呱”等，既起到意义上的强调作用，又体现出浓厚的感情色彩。这些个性化词汇巧妙地运用在叙事语言之中，颇有力道地展示了黔北独特的生活形态和语言表达方式，在细节处为作品增色不少，使得小说言语风格十分突出，具有一定的渲染夸张作用，诙谐生趣，增添了小说的真实感和趣味性。

冉正万的小说中，方言成为了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他采用了浓郁的方言进行叙事，原汁原味地呈现了地域性的谚语、俗语和特殊词汇，以实现一种生动、通俗和真实的语言追求。这些方言和俗语都源自于农民的乡土生活，是他们在劳动生产和日常交往中积累而来的，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土人情味。此外，民间口语中的个性化词汇形式新奇，栩栩如生，强调了黔北方言的独特地域风格。方言俚语和个性化词汇的运用，不仅展示了地域文化的魅力，还表达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经验，营造出了一一种真实可感的乡土生活氛围，强调了生活的实感和地域的温度。

生活在四牙坝的民众是冉正万小说表现的主体，他在创作中十分注重通过人物语言的使用挖掘农民的性格和心理，从而揭示他们的生存现实和精神世界。从整体上看，冉正万的小说到处都是人物对话，小说人物使用了原汁原味的农民语言，融入了大量的日常口语、方言土话，使人物语言更能彰显乡间人物独特的个性特征，真切地表现出人们隐秘的心理活动，从而塑造出一系列真实朴

素、鲜活生动的农民形象。在冉正万的笔下，农民以自己的方式说着自己的话，语言高度生活化、方言化，自然平实，带有一种地道的“土味”，充溢着鲜活的乡土气息和人情滋味，韵味深长。小说中范若奎跟孙国才截杀了一小队红军，为了回去邀功，巧遇孙国邦跟孩子佑能去贵阳卖银鱼，逼迫孙国邦帮自己，孙国邦回到家后范若昌知道自己弟弟杀了人孙国邦也参与，埋怨他没做好当哥的不拦住范若奎。孙国邦珍贵的银鱼没卖出去还把儿子佑能丢了，一路乞讨心里难过至极，还遭到埋怨所以一气之下有了以下这样的对话：

孙国邦怒气冲冲地嚼着最后一块泡姜，冲范若昌的背影大吼大叫：“范若奎与我球相干，他又不是三岁的细娃，他X过的女人可以站成排，他吃过的米可以堆成山，莫非还要我把他像老祖宗一样供起？”回头见女人一脸担心看着他，他说：“孙国才这个吃蛇肉的日脓包，应该打烂他的嘴！”（冉正万，2012，92）

这是非常典型的农民语言，以短句为主，口语中杂以俗语，方言词汇的运用更是把他的愤怒淋漓隐隐地嫌弃出来。

余得白给村里带种子回来的路途遇到了两个歹徒，搏斗后受伤，杨玉环心疼他，为了能减少他的疼痛就让余得白骑牛，喜欢八卦的人就问了起来：“你让它吃嘛，草那么好。”他说。正在这时碰到应生家的，这个妇人先是嘿嘿一笑，然后反倒不好意思地问：“二娘，你这是朗个的呀？”

“朗个的”是说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这样干。杨玉环故作不高兴地回答：“朗个的？驮余技术去治病，他的伤还没好完全，还不能走路。”应生家的立即顺水推舟地表示赞同和理解，“应该的应该的，水牛走得稳。余技术，你好些了没有哇？”（冉正万，2012，236）

这段对话把乡村人既好八卦的心又不敢冒犯杨玉环的心表现了出来。对于农村生活的熟悉和农民心理的了解，使得冉正万能够熟练地驾驭地域方言，并将其融入到不同人物的语言中。在小说中，人物使用了农民口语，使其更为亲切、自然、淳朴和朴实。他们的个性化语言中呈现出许多诙谐有趣的农村生活细节，强化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带有深厚的乡土温情。方言口音的使用使得人物语言在亲切中带有一丝粗糙，在平实中又带有批判的锋芒，准确地凸显了人物的身份、状态和心理特征。这不仅塑造了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且体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地域性特征。此外，语气词和疑问词在冉正万的人物语言中也大量存在，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生动而有趣，富有独特的乡土韵味。

三、小说的乡土意境

“意境就是人在审美活动中，用心灵去观照外界对象（包括艺术形象），在把握和领会对象的基础上，充分展开想象，在自己的思想意识领域超越外在的形象，从而创造出新的意象和境界”。

（朱立元，2016，237）和“意象”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一样，“意境”在中华美学的发展历史上源远流长，其丰富的理论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唐代王昌龄首次将“意境”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进行定义，在《诗格》中，他这样写道：“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



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韦学芳，2010，62）王昌龄之后，有关“意境”理论受到学人的持续关注，对“意境”的解读成为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焦点。从历代文论、诗论和画论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意境”与中国古代的诗、书、画以及小说之间关联非常紧密。

（一）营造意境的方法之一：情景交融

小说是创造意境的重要艺术形式，它创造了许多意境，展现了卓越的美学内涵。意境是主观情感和客观景象的结合，将情感与景象融为一体，形成美的境界。意境的表达非常复杂，它受人、时、地和景物的影响而变化，每一种意境都能够表达出独特的情感，散发出各种美的气息。如何实现情景交融？这需要创作者大胆发挥想象力。想象力的积极作用在于将不相关的景物与人的内心感受联系起来，创造出独特的意境。

小说在描述到日本鬼子即将进入到贵州境内，有着这样的景色描写：深秋的田野死气沉沉，已经冒出来的麦苗根本就看不见。黑色的翠鸟在里面啄食、跳跃，全然不知道什么叫恐惧。表达了全村人对日本人杀来的恐惧。（冉正万，2012，251）

小说中大当家范若昌娶进门的二太太杨玉环，生性活泼天真的少女，嫁到范家后，因为范若昌不爱笑，也不允许她开心地笑，甚至因为她生的儿子有白化病，所以心里隐隐地嫌弃她、嫌弃她并剥夺了她做母亲跟孩子亲近的权利。杨玉环虽然身份在村子高贵，但是内心的苦楚无处诉说，只能放牛的时候离开那个没有感情温度的家，她的天性才能让舒展一下。

她不再担心自己的笑声，她可以尽情欢笑。有时候一张嘴就哈哈大笑，有时候先皱一下眉头，然后再嘻嘻笑。如果什么事也没有，脸上就是一种自然而然地微笑。这种自然而然就像花正在开，树叶正在生长，白云在徜徉，溪水在流淌。（冉正万，2012，126）景物的描写不仅感受到那份欢愉更是让人从景物的描写中感受到那份活力跟生命力。杨玉环在家生命力都被打压的抑郁。所以在文中有这样的描述：

她的眼梢滑过那里时，觉得院子上空笼罩着一团黑色的氤氲之气，再看，才发现那是高大的黄桶树、皂角树和竹林共同制造出来的暗影。当她第一次放眼四牙坝时，心里有几分惊喜，哈，全都看见了。她嘿嘿笑。可当她再看一遍之后，觉得没什么好看的，木瓦房全都是黑色的，偶尔看见个什么人也是黑色的，他们都喜欢穿黑色的衣服。道路虽然不黑，但灰塌塌的，像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存在。她叹气着笑了笑。（冉正万，2012，128）“黑色的氤氲之气”“暗影”“黑色”“灰塌塌”一切景物全是暗沉的色调，也是体现了她心底的那份苦，生命的色彩被蒙上了阴影无法光亮起来。其实也是预兆着在这边暗沉色彩的土地上，生命力的消沉，不断地走向毁灭。情景交融中还注重情感的表达。

（二）营造意境的方法之二：虚实相生

虚实相生是意境营造的重要方法。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提到，艺术境界主



于美，其审美本质在于“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宗白华，1981，70）艺术意境的营造讲究情景交融，在这里更是被宗先生表述为同功利境界、伦理境界、政治境界、学术境界和宗教境界区别开来的意境创造本质——虚实相生。而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里，他对《考工记》《梓人为笋虞》一章中古代匠工制作笋虞的时候在鼓的下面放置木雕的虎豹进行分析。宗先生认为，匠工所为既能使虎豹显得更有生气，同时也让鼓声更加形象化，从而为整件艺术品增添了一份感动力量。“在这里艺术家创造的形象是‘实’，引起我们的想象是‘虚’，由形象产生的意象境界就是虚实的结合”。（宗白华，1981，39）宗先生不仅将“虚”与“实”作为艺术意境创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着重强调了想象在意境创构当中的作用。离形则无法想象，去想象则形之不存，只有将“虚”和“实”二者结合，才能创作出直抵心灵深处、展现生命之美的作品。

创造小说意境的过程涉及到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那么，“虚”和“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有些学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虚”是指故事以外的部分，而“实”则是指故事本身，如果太过注重“实”，就只能呈现故事而已；如果太过注重“虚”，就缺乏故事的根基。小说艺术的“虚”应该由“实”到“虚”，即小说家讲述一个好故事，但是又能够将其转化为虚幻的艺术形象，从而超越故事本身，达到美学境界。

大娘死后有一天晚上范若昌在梦中梦到了那条蟒蛇：蟒蛇像老人一样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它的伤口肿了，还在淌血，但它用手拍了一下，伤口就愈合了。……蟒蛇没有责怪他，给他加了一床棉絮。他感觉出来了，这不是蟒蛇，这是大太太。（冉正万，2012，32）在梦里大太太对他依旧如活着的时候一样贴心温暖，满脸笑意，爱意满满。亦如活着的时候一样，虚实难辨。即便是蛇身即便是临死前苍老的容颜，但是对她的思念与爱意依旧不减。如此描写，从未说一个爱字，却通过虚幻的世界将爱表达得淋漓尽致。情真意切、深情无限，虚景实情。作家以虚实相生的文笔，将人物内心的情感和对蟒蛇的愧疚全部表达。

范继书傍晚去找孙国邦闲聊。孙国邦迷迷糊糊回到梦中：在水里畅快地游来游去，水清澈透明，他愉快地看到水从身边划过，心旷神怡。范继书在说话，他感觉自己听见了，但听不大清楚，他想一定是自己的鱼耳朵太小了。……范继书走了好一会儿孙国邦才由银鱼变成人，他问：“什么放心了？”他撑起身看了看，并没看到范继书，他问孙佑贤：“范继书刚才是不是来过？我怎么会梦见他呢，他刚才就在我面前哪。”（冉正万，2012，218）

将虚的梦境中变身成一只鱼欢快地玩耍，与实的范继书出去游玩的愉快心情相映衬，虚实转化自然，孙国邦一辈子都在从捕捞银鱼中讨生活，辛勤劳累压抑苦闷很少欢笑，梦中化成一条自由的小鱼更是衬托出现实的劳苦。

结语

在《银鱼来》中，作者通过深刻的风俗与信仰叙事，将黔北地区范、孙两个古老家族百年的恩怨情仇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中描绘的朴素多彩的民风民俗，不仅展现了地域性、社会性和审美性的特征，更突显了人们在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动荡中的坚韧与顽强。



原始宗教信仰的叙事成为小说的重要一环。“万物有灵”的观念贯穿整个故事，驱鬼、符咒、祈求等巫术元素丰富了小说的神秘氛围。这些信仰不仅是文化传承，更是人们在面对命运波折时寻求庇护的表现。乡土特征在小说中得到深刻体现，通过意味深长的乡土叙事技巧，细节描写和乡土意象的运用，作者成功地刻画了黔北乡民形象。这些形象不仅具有具体的时空背景，更象征着乡民们不幸的命运，为整个故事赋予了深厚的内涵。


乡土意境的营造通过情景交融和虚实相间的手法，作者巧妙地营造出独特的氛围。《银鱼来》通过对黔北地区风俗与信仰的深刻描绘，以及乡土特征的生动展现，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彩、充满深意的故事世界。在小说中，人们无论何时都能坚强地活着，而“银鱼”则成为祈盼和平、祈盼幸福的象征。在这个由风俗与信仰交织而成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坚守与奋斗。小说所展现的黔北地区生存环境、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动荡中人们的命运，成为一幅生动而深刻的画卷。通过这样的叙事，我们不仅了解了一个特定地域的文化底蕴，更感悟到人类面对困境时的勇气和智慧。

参考文献

- 邓小敏. 《银鱼来》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以《白鹿原》为参照. [硕士学位论文]. [D] 贵州师范大学.
- 李勇. 边境叙事的局限性——冉正万《银鱼来》述评[J]. 新文献评论, 2016. 12: 22-26.
- 刘丽娟. 论冉正万小说《银鱼来》的生态意识[J]. 文学教育, 2016. 2: 14-16.
- 冉正万. 《银鱼来》[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
- 王海燕、魏耀武. 冉正万《银鱼来》评述[J]. 文学教育, 2013. 9: 18-19.
- 韦学芳. 唐代诗歌意境理论的发展史概说[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0, (08), 62
- 赵学勇、卢慧静. 乡土叙事的嬗变: 从《长河》到《山本》. 文艺争鸣, 2020-7-1 [2023-3-6].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20/0701/c404030-31766299.html>
- 这首《银鱼来》，堪比《白鹿原》. 凤凰文化. 重庆晨报, 2012-11-11 [2023-3-2].
https://culture.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11/11/19025226_0.shtml
-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 2010, 23
- 朱立元. 《美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237
- 宗白华. 《美学漫步》[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39、70



Author (1) Information (第一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MA YUJIAO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Master's degree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Modern Chinese
	Address (地址) : CITY HOME RESIDENT 49/17-19 moo 6, Prachachuen 12(1-4) Thungsonghong, Laksi Bangkok, Thailand 10210

Author (2) Information (第二作者信息)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 KANOKPORN NUMTONG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ddress (地址) : Faculty of Humanities Kasetsart University 50 Thanon Ngamwongwan, Lat Yao, Chatuchak, Bangkok 10900

